

本土化视野下的坦桑尼亚教学语言问题*

李 丹

内容提要 独立至今，坦桑尼亚未曾经历过剧烈的社会、政局动荡，也不存在尖锐的民族、种族矛盾，国内局势相对平稳，作为族际通用语的斯瓦希里语功不可没。然而，当下坦桑尼亚正在逐步远离建国初期的“斯瓦希里化”梦想，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在教育领域内的博弈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教学语言危机。在多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斯瓦希里语的发展渐趋迟缓，教育本土化大业渐被侵蚀。在英语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语言政治化、精神殖民化、教育精英化等趋势严重阻碍了坦桑尼亚扩展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职能的多次尝试。英语与斯瓦希里语在坦桑尼亚的角逐也是后殖民非洲国家中语言地位级差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斯瓦希里语 教育本土化 教学语言危机 语言地位级差

作者简介 李丹，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大连116600）。

坦桑尼亚是东非地区民族最多的国家，但国内没有一个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发挥过影响全局的作用。^①独特的民族构成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大族压迫小族、民族矛盾尖锐的局面，十分有利于国家的文化整合。99%的坦桑尼亚人熟练掌握斯瓦希里语，这门通用语所具有的民族中立、传播广泛等特征契合了国家政治制度变革的需要。正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斯瓦希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5CYY003）和大连民族大学博士启动基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坦桑尼亚共有126个民族，人口较多的民族包括苏库马族、马孔德族、查加族、尼亚姆韦齐族、哈亚族等。

里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坦桑尼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

然而，语言规划是一场利益驱动的博弈，其中的利益相关者总是试图通过制定那些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内容以获取利益。在非洲，前殖民语言和本土语言在教育领域内的地位规划尤为适于诠释语言规划的“博弈”本质。^①语言现实无法与历史割裂，后殖民非洲国家现阶段的语言规划导向仍旧带有清晰的殖民印记。追溯坦桑尼亚语言教育规划的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透视该国教学语言危机的深层次动因，挖掘语言教育、语言地位、语言选择与政治权力间的作用机制，借此提炼出后殖民非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教育本土化事业中所面对的重重阻力。

坦桑尼亚语言教育规划发展史

历史上，坦桑尼亚先后处于德国和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之内^②，独立后又陆续经历过两次政治体制转型。在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坦桑尼亚本土语言斯瓦希里语教育规划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一）将斯瓦希里语作为殖民地通用语

德国的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巩固了斯瓦希里语的通用语地位；相较而言，英殖民政府更加重视宗主国语言在殖民地的传播，积极树立英语的官方地位，强化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实质上，斯瓦希里语作为通用语地位的确立并非殖民者刻意推广的结果，因为早在德国确立殖民统治之前，斯瓦希里语已成为坦噶尼喀大陆（即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的通用语。然而，出于对民众形成“统一战线”的担心，当地的德国政府官员曾一度要求采取紧急措施，阻止斯瓦希里语的进一步传播。事实上，德国对该国的殖民征服从一开始即遭到了坚决抵抗。1905年爆发的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是坦噶尼喀现代史上首次跨越民族界限的反殖民运动。斯瓦希里语团结了来自不同民族的起义者，培养起共同

① [美国]詹姆斯·托尔夫森：《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二版），俞玮奇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② 1885年，柏林会议将坦噶尼喀内陆划归德国势力范围，沿海16公里宽的地带仍属桑给巴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7年11月，英国占领坦噶尼喀全境。1919年，根据凡尔赛条约，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46年，坦噶尼喀成为英国的托管地。

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成为民族融合的动员工具。

自确立殖民统治起，德属东非当局便急需一门通用语以管理殖民地行政事务。最初，具有伊斯兰特征的斯瓦希里语被排除在外，德语也未在候选之列。部分原因在于德国人担心德语的“尊贵品质”被他人玷污；另一部分原因出于警惕非洲人通过学习德语获取西方进步理念，从而威胁殖民统治。^①因此，在马及马及起义前，德属东非并无任何语言推广的大规模举措。

马及马及起义客观上帮助德国殖民者做出了语言选择，他们充分意识到并决定发挥斯瓦希里语的工具性职能。但出于对伊斯兰文化的忌惮，德国语言学家卡尔·梅诺夫（Carl Meinhof）提议用拉丁语书写体取代阿拉伯语书写体，用德语词汇取代阿拉伯语词汇，真正实现斯瓦希里语的“去伊斯兰化”。^②如此一来，经过“净化”的斯瓦希里语遂有望为殖民者服务。通晓斯瓦希里语成为当地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必备条件，甚至连德殖民政府官员都积极主动地学习这门非洲本土语言。^③

对德国人而言，大规模使用和推广斯瓦希里语是出于实现殖民目标、便于殖民地管理等实用目的的考虑，如幽灵般无处不在的英语才是他们最大的梦魇。德属东非的一份报纸曾如是评论：英语必须被逐出东非，德语和斯瓦希里语足以发挥所有语言职能。然而，一战后，德国不得不放弃在坦噶尼喀的统治权，英国顺势接管，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全部落入英国掌控之中。

与前任殖民者不同，英殖民政府大力推行宗主国语言，旨在刻意培养少数精英以充当殖民者和民众间的沟通桥梁，并规定基础教育前5年将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中等教育及以上教育阶段一律采用英语。1946年，殖民政府推出“坦噶尼喀十年发展与福利规划”，明确指出：在理想状态下，小学入学率应达到100%，中学入学率最好不超过4%。^④在推进英语教学的同时，英殖民政府并未置斯瓦希里语于不顾，语言本土规划逐步展开。1930年，跨

^① Birgit Brock-Utne, “Book Review of Cross - Border Languages: Reports and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46, No. 2, 2000, p. 176.

^② Charles Pike,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Swahili Literature and Resistance to German Language Imperialism in Tanzania, 1885 - 19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 No. 2, 1986, p. 224.

^③ Eustard R. Tibategeza, “Language - in - Education in Tanzania: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he Free State, 2009, p. 132.

^④ “Language Policy fo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http://www.swarthmore.edu/SocSci/Linguistics/Papers/2007/sa_eleuthera.pdf, 2014 - 07 - 14.

境语言委员会成立，成员国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该委员会旨在促进斯瓦希里语标准化、出版斯瓦希里语教材、设置英属东非语言课程。^① 随后，东非文学局成立，大力提倡青年作家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文学创作。

然而，面对斯瓦希里语的蓬勃发展，菲尔普斯-斯托克委员会（The Phelps-Stokes Commission）^② 曾深表担忧，并提醒殖民政府不应放松敦促民众学习其他本土语言、英语或其他欧洲国家语言。1953年，《宾斯传教团报告》（Binns Mission Report）指出，斯瓦希里语影响了其他本土语言和英语的学习，扰乱了整个教育系统；出于非洲学生利益考虑，应将斯瓦希里语逐出校园。但这一提议最终未获采纳。^③

英殖民政府虽然并未限制使用斯瓦希里语，相反还提升了其标准化程度，但精英式教育人为拉大了阶层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再现为语言差距，仅允许少数人接受英语教育的规定导致了社会分层，其结果是语言与政治权力被强行绑定。独立后，这少部分精通英语的人晋级为国家统治精英，其语言偏好和语言态度对坦桑尼亚的语言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独立初期确立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

坦桑尼亚在建国初期沿袭了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继而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又转向资本主义制度。^④ 社会主义时期以“斯瓦希里化”（Swahilization）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斯瓦希里语被广泛应用于所有公共领域中。独立初期是“斯瓦希里化”政策的筹备阶段，也是即将践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缓冲阶段。国内政治局势尚不稳定之时，当政者有必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

坦噶尼喀大陆独立^⑤时，大多数居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斯瓦希里语。1962

① Tage A. Biswalo, “Policy Processes in Relation to Language in Tanzania: Examining Shifts in Language Polic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10, p. 32.

② 美国纽约菲尔普斯-斯托克委员会创立于1911年，其创立者卡罗琳·菲尔普斯·斯托克女士对黑人职前教育模式深表支持，并积极给予资助。20世纪20年代初，该委员会筹建了一个由英美教育界人士组成的调查组，负责调查非洲的教育状况。该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洲教育的复兴。

③ Casmir M. Rubagumya, “Language Promotion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The Example of Tanzan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37, No. 1, 1991, pp. 67-68.

④ Imani N. Swilla,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Tanzania: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deology,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Vol. 30, No. 1, 2009, p. 2.

⑤ 1961年12月，坦噶尼喀宣布独立。1964年4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1963年12月独立建国）两国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年，坦桑尼亚的宪法规定：“坦噶尼喀的语言是英语和斯瓦希里语”。^① 1964年12月10日，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在坦桑尼亚共和日当天发表斯瓦希里语演讲。这是坦桑尼亚语言规划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得以确立。作为斯瓦希里语笃定的拥护者，尼雷尔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髓和灵魂所在，缺乏文化的国家不过是由一群没有灵魂的人拼凑而成；殖民主义的罪恶在于教唆殖民地民众以本土文化为耻，迫使他们否认本土文化的存在价值。^②

坦桑尼亚建国初期基本沿用了殖民时期的语言教育实践，即斯瓦希里语在基础教育前四年用作教学语言，五年级起作为语言课程讲授；三、四年级开展英语课程学习，五年级起英语取代斯瓦希里语用作教学语言，并一直持续至高等教育阶段。1964年，文化艺术司内设立“国语处”，主要职能包括扩大斯瓦希里语的使用范围，确保其在政府、学校中的应用；去除语言糟粕，指明语言发展的正确道路；实现书写系统和语言的标准化；鼓励所有坦桑尼亚人学习合乎语法的斯瓦希里语。同年，斯瓦希里语研究所成立，负责收集、编纂斯瓦希里语新词并规范其使用。如此大规模的语言规划举措旨在为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化”做好前期准备。

（三）在教学语言中普及与应用斯瓦希里语

在社会主义变革时期，坦桑尼亚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67年1月，执政党坦盟中央执委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发展纲要》，亦称《阿鲁沙宣言》（The Arusha Declaration），正式宣布坦桑尼亚将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该宣言概括了乌贾马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以乡村发展为主要目标。乌贾马社会主义的教育理念体现为尼雷尔所倡导的“为自力更生而教育”（Education for Self - Reliance）原则。

依据“为自力更生而教育”原则的内容所述，教育能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教育应该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减少对西方的依赖；教育应以满足国家需要、提供终身教育为目标，避免教育分层。^③ 1967年，共和

^① Birgit Brock - Utne and Rodney K. Hopson eds, *Languages of Instruction for African Emancipation: Focus on Postcolonial Contexts and Considerations*, Mkuki na Nyota Publishers, 2005, p. 54.

^②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The Tanzanian Experience. apjee. usm. my/JPP_11_1991/Jilid 11 Artikel 06. pdf, 2014 -09 -26.

^③ Julius K. Nyerere, *Education for Self - reliance*,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国总理和第二副总统卡瓦瓦 (Rashid Kawawa) 宣布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作的前提下, 斯瓦希里语可用于处理政府事务, 英语将作为第二官方语言填补斯瓦希里语所不具备的语言功能空缺。^① 随后, 卡瓦瓦宣布小学一至七年级课程全部使用斯瓦希里语讲授, 所有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院必须以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

在“为自力更生而教育”原则之下, 坦桑尼亚政府重视发展面向大众的全民基础教育, 即每个坦桑尼亚儿童, 无论出身、种族或宗教信仰, 都享有进入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学习的机会。《阿鲁沙宣言》和“为自力更生而教育”原则问世后, 斯瓦希里语正式成为公立小学的教学语言。在乌贾马社会主义时期, 斯瓦希里语象征着与西方不结盟的政治立场, 全民教育成为实现自力更生的前提条件。^②

为了实现“斯瓦希里化”目标, 根据坦桑尼亚议会 1967 年第 27 号法案的内容, 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成立, 由共和国总统担任名誉主席, 足见国家对这一机构的重视。^③ 1970 年, 斯瓦希里语研究所并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专门从事语法、修辞、文学、字典编纂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该大学设立斯瓦希里语文学系, 负责培养斯瓦希里语教学和研究人才。除此之外, 桑给巴尔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 旨在促进斯瓦希里语的应用与推广。

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 斯瓦希里语的国语地位已获得全体国民的一致认可。在乌贾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 英语被视为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精英制度的爪牙; 斯瓦希里语则是挣脱殖民主义枷锁、实现国家解放的标志。^④ 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以斯瓦希里语为唯一教学语言, 成效显著。1974 年, 政府普及基础教育, 1980 年入学率达到 98%; 1977 年, 成人文盲率由原来的 75% 下降到 17%。^⑤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应归功于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践活动。

① Brock - Utne, op. cit., p. 54.

② Frances Vavrus, “Postcoloniality and English: Exploring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Tesol Quarterly*, Vol. 36, No. 3, 2002, p. 376.

③ 葛公尚:《国语的选择与推广: 坦桑尼亚语言政策研究》, 载《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5 页。

④ Charles Bwenge, “English in Tanzania: A linguistic Cultural Perspective”, *IJlitic*, Vol. 1, No. 1, 2012, p. 172.

⑤ Tibategeza, op. cit., p. 144.

(四) 扩展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语言职能

坦桑尼亚国民对斯瓦希里语的热情加速了语言发展。与此同时，他们对英语的情感却复杂了许多。原因在于，斯瓦希里语迟迟未能获得作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教学语言的合法性，英语仍是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自1965年起，两种语言间的矛盾关系时常激起全国性的热烈讨论，与此相伴的是扩展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职能的多次尝试。

早在1969年，坦桑尼亚政府就尝试将斯瓦希里语用作小学以上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国家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1969~1974年）指出，小学到中学的教学语言断层产生并固化了语言沟壑，导致高等教育脱离国家、国民的实际需要。当然，教学语言转换也不可一蹴而就，应为筹备教材和积累师资力量留有充裕时间。^① 1969年，教育部向各中学校长发放公告，概述了斯瓦希里语逐步取代英语的时间安排。依据公告内容，政治教育^②、家政学以及历史、地理、生物、农学、数学等多个学科分别从1969/1970学年、1970/1971学年、1971/1972学年起，使用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③ 政府相关机构即刻承担起语言本体规划的任务。截至1975年，政治教育、地理、商业、数学、历史、农学、家政学等学科已具备斯瓦希里语教材，同时经济学、生物学、化学、技术教育、物理学等学科也已实现斯瓦希里语术语现代化。^④ 然而，自1969/1970学年以来，整个改革项目戛然而止，斯瓦希里语进军中等教育的计划触礁。

1980年，总统尼雷尔授权时任教育部长马克维塔（Makweta）成立总统教育委员会。1982年2月，委员会提交调研报告，建议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实现英语到斯瓦希里语的教学语言转换。遗憾的是，该项提议在后续报告中被无故删除。上述调研报告提交两年后，坦桑尼亚政府申明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践有待进一步加强。^⑤ 此言论一出，国内一片哗然。

^①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Second Five - Year Pla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Printers, 1969, pp. 152 - 153.

^② 政治教育是一门学习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治哲学体系的学科，以乌贾马社会主义为主要教学内容。

^③ Brock - Utne, op. cit., p. 57.

^④ Zaline M. Roy - Campbell, "Power and Pedagogy: Choosing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anzan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2, p. 161.

^⑤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Rec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81 - 1983*, Government Printers, 1984, p. 19.

1984年,在英国政府资助下,克里普(Criper)和陶德(Dodd)二人就坦桑尼亚国民的英语水平开展调研。结果显示,仅有10%的中学四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了英语用作教学语言的要求,仅有20%的受试大学生能够轻松阅读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英文文献。面对这一结果,二人最终仍建议坦桑尼亚教育部确定英语为教学语言。^①1987年,英语教学资助项目与英国政府对坦桑尼亚的发展援助一同开启,获得英国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即在教育系统中继续开展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活动。

现实情况是,坦桑尼亚的教育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只有10%的小毕业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这其中又仅有2%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②国家教育与职业培训部2013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06~2012年间,私立小学数量占学校总数的0.02%到0.05%,接受私立教育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剩余99%的学生全部入读公立学校。上述数字如实反映出坦桑尼亚教育的精英本质。私立学校以英语为最大卖点,学生一入学即接受全英语教育,这对于家长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公立学校学生需在中学阶段完成斯瓦希里语过渡到英语的教学语言转换,无论在认知水平还是学业发展方面都对学习者提出了巨大挑战;相反,全英语教学则意味着各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能够完美承接。然而,私立学校的高昂费用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围。通常情况下,接受私立教育的多为精英阶层子女,英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在精英家庭中传承,而这种优势条件为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所望尘莫及。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及其成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化势头迅猛发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此同时,非洲大陆爆发经济危机,迫切需要外部援助,西方国家由此获得插手非洲事务的机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非洲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坦桑尼亚随后被卷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中。除此之外,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剧烈动荡,坦桑尼亚自1992年起实行多党制,逐步抛弃了

^① C. Criper and W. Dodd, *Report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and Its Us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ODA/British Council, 1984, pp. 14-73.

^② Y. I. Rubanza, "Can a Three-tier Language Policy Model Work in Tanzania? A New Perspective",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24, No. 1, 1996, p. 84.

社会主义建国理念，“乌贾马社会主义”时代宣告终结。自此，就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地位问题，国内形成两大阵营，其对立态势主导着语言教育的发展走势。

（一）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发展陷入困境

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调整引发了教育体制转型，私立教育逐步合法化，语言天平逐渐向英语一端倾斜。面对英语带给其使用者的社会地位、经济优势、受教育机会、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等诱惑，国民对英语的追捧程度甚至超越了殖民统治时期，斯瓦希里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践陷入了重重危机。

究其根本原因，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规划导向致使私立英语教育大受青睐，民众逐渐滋生出对本土语言教学的消极态度。1992年，坦桑尼亚政府公开准许私立小学开展英语授课。1993年，教育文化部公文规定将“政治教育”重新更名为“市政学”，以英语为授课语言。^①在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发展举步维艰之时，为了获得西方资金援助，教育部、总理办公室、规划委员会、课程发展委员会等政府机构被迫接受随之而来的附加条件，如实行教育私有化和教材市场自由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内容具体包括：削减政府对公立学校的投入，实行教育收费，废除全民教育，使用国外教材和西方考试制度等。^②坦桑尼亚逐渐丧失了对本国教育事务的决策权，教育沦为西方国家操控坦桑尼亚人民的政治工具。

“斯瓦希里化”时期奠定的斯瓦希里语的优势地位出现松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语言教育规划与相关政策内容开始显露出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迹象。1995年，教育文化部出台《教育培训政策》（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其中第五章“正规教育与培训”（Form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详细规定了学前教育到中等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和语言课程设置，具体内容如下：其一，学前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为斯瓦希里语，英语为必修科目；其二，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语言为斯瓦希里语，英语为必修科目；其三，中学阶段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斯瓦希里语自初中一年级起为必修科目；其四，英语是中学阶段的教学语言，大多数教材只具有英语版本，这种局面可能会长

^① Birgit Brock - Utne,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Africa see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Soci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2002, p. 21.

^② Birgit Brock - Utne, “Cultural Conditionality and Aid to Education in East Afric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41, No. 4, 1995, pp. 178 - 184.

期保持。因此,小学一年级应开展英语课程学习,确保七年基础教育后,学生具备足够的英语识字能力,以应对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就业市场对英语能力的要求。^①

上述规定标志着英语在教育领域全面反弹。表面上,《教育培训政策》沿用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各司其职的惯例;实质上,斯瓦希里语已经倒退为仅具有过渡性质的教学语言。整体而言,《教育培训政策》内容笼统,既缺乏具体实施步骤和指导方针,决策部门又无从对政策的实施予以全程监管。宽泛的政策内容和宽松的实施步骤加大了政策实施难度。^②除此之外,《教育培训政策》鼓励私人机构参与教育事务,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为自力更生而教育”的原则。

1997年,教育文化部出台《文化政策》,其中第一章涵盖对国语、本土语言、外语和教学语言的相关规定。其中第一条“国语”规定:坦桑尼亚宪法应将斯瓦希里语确立为国语;鼓励个人或机构使用斯瓦希里语写作或出版;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负责斯瓦希里语的研究与推广;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应与其他斯瓦希里语推广机构加强合作,获取充足资源,发挥各自职能;其他本土语言应继续促进斯瓦希里语发展。第二条“本土语言”规定:我们的人民应使用本土语言,并引以为傲;对本土语言社区、个人和机构研究、记录、保存、翻译本土语言的行为予以鼓励;对编纂本土语言词典和语法书的行为予以鼓励;对公立和私立机构出版、传播本土语言材料的行为予以鼓励。第三条“外语”的规定为:英语应成为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各阶段的必修科目,在高等教育中同样鼓励,英语教学有待进一步加强;鼓励教授其他外语,如法语、葡萄牙语和俄语。而第四条“教学语言”则规定:设定并实施专项计划,以确保斯瓦希里语用作所有教育和培训阶段的教学语言;斯瓦希里语应成为学前教育、小学和中学各阶段的必修科目在高等教育中同样鼓励,斯瓦希里语教学有待进一步加强。^③

与《教育培训政策》相比,《文化政策》具有一定进步性:一方面,除

^①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of Tanzania”, http://www.moe.go.tz/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view&gid=108&Itemid=617, 2014-09-30.

^② Eustard R. Tibategeza and Theonie du Plessis, “Language - in - Educ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n Tanzania: An Overview”, *Language Matter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Vol.43, No.2, 2012, pp.196-197.

^③ “Cultural Policy for Tanzania”, <http://www.tzonline.org/pdf/culturalpolicy.pdf>, 2014-11-07.

斯瓦希里语外的其他本土语言获得了正式认可，这在坦桑尼亚语言规划史上尚属首次；另一方面，政府鼓励学习、研究、书写本土语言，肯定了其他本土语言对斯瓦希里语的积极作用，充分认可了国家语言多样性事实。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斯瓦希里语外的其他本土语言仍被禁止用于报刊出版和广播传媒等领域。出于对语言部族主义的担忧，政府甚至禁止人口普查人员向被调查者询问任何与语言使用相关的问题。^①与此同时，《文化政策》措辞含糊，如第四条第一款不仅就如何制定、实施、评估相关计划等核心问题缺乏实质性指令，而且对斯瓦希里语取代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实际困难太过轻描淡写。这些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决策者对待语言问题的暧昧态度。

1998年，坦桑尼亚教育文化部的一份咨询报告建议：自2001年起，将斯瓦希里语用作中学阶段的教学语言。1999年，旨在制定《文化政策》实施策略的会议在阿鲁沙召开，会议号召教学语言转换计划即刻进入筹备状态，确保斯瓦希里语五年内能够成为初中一年级的教学语言，并逐步取代英语在更高教育阶段得以使用；国家斯瓦希里语协会负责协调制定实施草案。然而，会议报告也提到“资金匮乏是政策实施面临的首要困难，所有需要资金扶持的计划不得不推迟执行”。鉴于坦桑尼亚国内现实，实现教学语言转换的目标恐将遥遥无期。

私立教育合法化以来，教育部为私立学校制定了全新的英语版教学大纲。自2000年起，私立小学学生可以使用英语作答毕业考试试卷，而以往斯瓦希里语是唯一的测试语言。2003年，教育文化部第二号教育公告明确规定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分开测评。此前，学生则可以在两种语言中任选其一。上述政策内容不仅有失公允，为私有化教育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严重偏离了《教育培训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基本方向，凸显坦桑尼亚语言教育政策缺乏连续性、充满任意性、前后矛盾等特点。2004年，教育文化部第九号教育公告对中学课程调整做出如下指令：每周3学时用于斯瓦希里语授课；英语授课时间为每周7学时，两年后降为6学时。这种安排与坦桑尼亚国内流传甚广的教育理念不无关系，即延长英语授课时间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斯瓦希里语随处可见，因此没有必要花费大量时间专门学习。2009年，教育

^① “A Three - Tier Citizenship: Can the State in Tanzania Guarantee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2705874_A_three_tier_citizenship_Can_the_state_in_Tanzania_guarantee_linguistic_human_rights, 2015-09-27.

与职业培训部提议制定全新的《教育培训政策》，准许英语授课从学前教育起持续至高等教育阶段。^①

斯瓦希里语的弱势地位同样波及桑给巴尔岛。2006年，桑给巴尔开展教育政策回顾，总结了1996~2006年间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中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偏低。政府遂决定在小学五年级将这两门课程的教学语言由斯瓦希里语转换为英语，以帮助学生为中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此外，五年级新增“信息、交流和技术”学科，以英语为授课语言。^②上述决定影响深远，原因在于桑给巴尔岛是斯瓦希里语的大本营，岛上居民几乎全部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这本应是斯瓦希里语链条中最为牢固的部分，现已出现松动，由此敲响了斯瓦希里语影响全面式微的警钟。

教育领域内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矛盾对立所引发的教学语言危机，具体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政府明知教师和学生的英语水平欠佳，却仍坚持推行英语授课；其二，为保证教学效果，教师时常使用斯瓦希里语授课，学生却需要使用英语作答结业试卷。在与英语的博弈中，斯瓦希里语的一次次后退标志着坦桑尼亚教育本土化事业的倒退，“斯瓦希里化”成果现已所剩无几。语言教育导向深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政治格局变动的的影响，英语意识形态已在坦桑尼亚悄然苏醒。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背后是多重因素相互牵制、彼此制约的现实。

（二）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的深层原因

建国初期，斯瓦希里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族际通用语的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和传播媒介。然而，当轰轰烈烈的独立热情逐渐退去，更为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伴随着“斯瓦希里化”梦想渐行渐远，教学语言之争迟迟没有定论。争论焦点无外乎以下三方面：基础教育阶段是否应该开展英语授课；中等教育阶段能否继续斯瓦希里语授课；两种语言在各教育阶段应该如何分配教学语言职能。通常情况下，选择一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能否确保有效学习？语言选择是否与国家整体目标相一致？备选语言的本体发展程度、相关教材和教师数量是否已

^① Martha A. Qorro,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Tanzania: Why Are Research Findings Not Heede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59, 2013, p. 28.

^② Zehila Babaci-Wilhite, “Local Languages of Instruction as a Right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Sustainability*, Vol. 5, 2013, p. 1997.

达到用于授课的基本要求?^① 斯瓦希里语显然已经满足了上述客观条件。斯瓦希里语授课既有利于宏观上提高国家整体教育质量, 激发国民创造性, 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主建设进程; 又有利于微观上减轻学生挫败感, 树立自信心, 实现认知能力和个性的健康发展。

然而, 迄今为止, 斯瓦希里语非但未能成功入主中等教育, 其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也已风雨飘摇。坦桑尼亚教学语言危机源自后殖民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间未曾剪断的殖民“脐带”, 又与国内政治紧密相关。语言教育成为支配与权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媒介, 并扮演着强化社会不平等和群体分化的角色。这一现实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后殖民非洲国家的共有特点, 是英语全球化视域中语言政治化、精神殖民化、教育精英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语言政治化

语言是记录政治发展历程的活化石, 因此语言时常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 并最终具体化为语言政策。^② 坦桑尼亚教学语言危机是语言问题严重政治化的产物, 语言政策被用作争夺政治权力的武器, 成为权力集团垄断特权、实现特权再生产的有力工具。

在坦桑尼亚, 斯瓦希里语国语地位的确立或以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演说为标志, 或以具体语言实践为准绳, 《宪法》或与语言相关的法律文件从未曾对此做出明确规定, 因此斯瓦希里语是“事实上”(de facto)、而非“法律上”(de jure)的国语。坦桑尼亚实行双官方语言制度, 但只有英语是商业、法律、教育等高端领域的首选语言。这种政策导向和语言偏好实质上反映出后殖民非洲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语言金字塔结构。前殖民语言永远处于塔尖, 主体民族语言或地区通用语屈居其后, 其他本土语言位于金字塔底端。坦桑尼亚的语言金字塔结构如图1所示。

英语虽然使用人数有限、地域分布促狭, 却能够带给使用者声望、权力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与英语相比, 斯瓦希里语的使用人数多、分布范围广, 却远不能赋予其使用者与英语相匹敌的社会地位和上升空间, 其他本土语言更是如此。这一结构刻画出坦桑尼亚的语言多样性现实和语言地位等级势差。

^① Ralph Fasold,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Basil Blackwell, 1984, p. 292.

^② 薄守生:《论语言政治》, 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第12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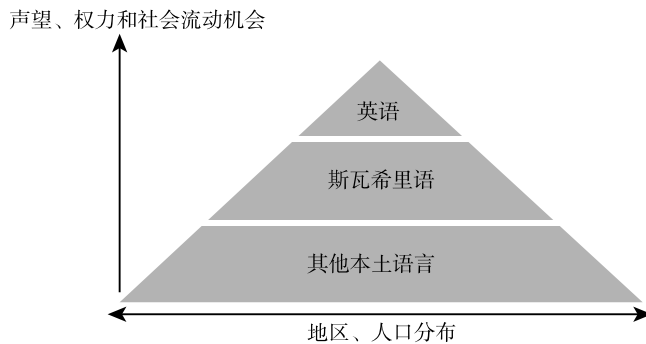


图1 坦桑尼亚语言金字塔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坦桑尼亚语言结构情况绘制。

斯瓦希里语和英语的地位更迭很大程度上与坦桑尼亚国内的政治制度交替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时期，政府大力推广斯瓦希里语，出台“斯瓦希里化”长远规划，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热情逐渐冷却，资本主义回潮，全面振兴斯瓦希里语的诸多计划几经搁浅，最终被放弃。英语成为宣扬多党制、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思潮等西方意识形态的语言，语言的政治属性呼之欲出。

归根结底，在语言政治化这一动态过程中，语言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谁能控制语言使用，谁就能控制通往政治舞台的通道。只要有一种精英分子或官方行政通用的优势语言存在，那么无论精英人数多少，这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多低，都会产生一个以优势语言为标志展开沟通的精英群体。优势语言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享有独尊地位。^① 优势语言象征着统治阶层的权力地位，语言势差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语言格局深受该国的政治局势左右。

2. 精神殖民化

斯瓦希里语教学语言危机源自西方殖民统治的后续影响，而坦桑尼亚并非唯一在教育本土化事业中屡遭挫败的后殖民非洲国家。非洲大陆殖民化不仅意味着非洲人民失去了政治、经济自主权，同时意味着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依附于宗主国。西方殖民者不仅强占非洲作为原料产地，更是通过

^① [英国]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9页。

思想上愚化民众，割断非洲人与非洲文化、传统的联系，进一步操控失去“文化之根”的非洲人民。

与常见殖民形式不同，精神殖民的作用更为深远，作用机制也更为隐蔽。精神殖民并非一定依附于客观存在的殖民体制，政治、军事殖民终结也并不意味着精神殖民随之瓦解。精神殖民是“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一种形式，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思维空间的干预，影响后者的思维结构、思维运作模式和思维内容中的核心成分，所产生的效果持久且不易消除。双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这种无意识特征正是精神殖民的罪恶所在，它往往可以在政治殖民消退以后继续禁锢被殖民者的思想。当被殖民者承认殖民者的“文明开化思维”优于自己的“原始思维”时，精神殖民化过程宣告完成。

20世纪见证了西方世界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全球传播，语言成为传播和渗透西方价值取向、殖民化民众思想的绝佳工具，西方殖民者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流入非洲国家，本土语言和文化遭遇生存危机。为了继续控制殖民地，宗主国通常在给予殖民地政治独立前，预先培植一批受过西方教育、能够代理自己实施统治或至少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物，将他们设定为交权对象。^①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既不完全了解本国国情，又缺乏治国经验，按照欧洲模式建国已成为非洲各国统治精英的共同目标，搬用西方政治、经济结构和体制成为后殖民非洲国家的普遍特点。^②国家独立后，统治精英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拥护者和倡导者。

正如《关于非洲语言与文学的阿斯马拉宣言》（Asmara Declaration on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所说，殖民主义是非洲语言和文学发展的最大障碍，殖民枷锁依然束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并继续殖民化非洲人民的精神世界。^③无论在殖民地时期，还是后殖民时期，抑或在本国或在殖民属国中，西方国家始终无法坦然面对语言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在历史上很长一段

① 潘兴明：《试析非殖民化理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2页。

② 陆庭恩：《关于非洲非殖民化的几个问题》，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第6页。

③ “Asmara Declaration on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http://www0.sun.ac.za/taalsentrum/assets/files/Asmara%20Declaration.pdf>, 2015-02-12.

时期内,西方社会歧视兼通双语或多语者,双语能力和双语现象被视为严重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①对“单一语言、单一文化”(Monolingualism & Monoculturalism)的偏爱在西方社会蔓延,其渗透程度之深以至于非洲殖民属国的建国理念完全被其左右。宗主国语言被视为彰显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完美选项,本土语言则被贬低为“部落语言”和“未开化”的语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欠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国民也缺乏独立的文化意识和自主性。

学校是开展精神殖民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对许多儿童而言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以学校为背景的实践活动总是能够唤起民众的积极回应。^②正因为如此,教学语言选择可以成功地塑造普通人的语言思维和语言态度,前殖民语言的教学实践固化了“本土语言无用论”思想。非洲民众接受了布朗特(Blaut)所说的“殖民者世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非洲本土语言与发展、进步等概念格格不入,任何优秀的东西都产自西方国家进而向边缘国家或地区扩散。^③这种思维范式实质上是“欧洲中心论”和“白人至上论”霸权思想的一种延续。

由此可见,后殖民非洲国家彻底实现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征程还很漫长。几内亚政治家塞古·杜尔曾说,“如果有人认为取得独立就万事大吉,可以不必再作努力,那他就是不睁开眼睛看看现实状况,就是同历史的进程背道而驰”。^④爱德华·萨义德将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反抗分为两种:一种是“收复领土”的反抗,即“一线反抗”;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反抗”,即“二线反抗”,也就是文化反抗。文化反抗必须使被囚禁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恢复本来面貌,必须组织并维系社会记忆。^⑤大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一线反抗”,建立起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二线反抗”战果稀少。西方语言意识形态仍然左右非洲民众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制约他

① Ronald Wardhaugh,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2nd edition), Blackwell, 1992, p. 101.

② Carol Benson, “Bilingual Programs as Education Development: Access, Quality, Empowerment and Equity”, in *Empowerment through Language and Education: Cases and Case Studies from North America, Europe, Africa and Japan*, Peter Lang, 2006, p. 9.

③ J. 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④ 陆庭恩:前引文,第6页。

⑤ 张其学:《非殖民化中的文化抵抗与民族主义》,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6期,第68页。

们的语言选择，并最终影响国家的语言生活。

3. 教育精英化

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公众行为、指引舆论导向、塑造观察视角的潜能。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往往由精英偏好而定，反映精英阶层的态度和价值观。^①

在非洲国家中，教育是主要的权力来源。一位尼日利亚天主教传教士曾说：“无论是谁，掌控学校就意味着掌控国家、掌控宗教、掌控未来”。^② 教育中的语言选择能够决定群体参与教育的程度和个人受教育机会的多寡，进而影响学习者最终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潜力。教育中语言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中教学语言选择又是重中之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大力提倡母语教育，将其作为“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关键所在。然而，许多非洲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认知水平发展，强化了教育不平等格局，破坏了民主建设进程，而且加深了非洲国家对西方的依附，削弱了自身发展潜力，导致儿童陷入身份认同误区，最终阻碍了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和非洲文明的伟大复兴。

与其他后殖民非洲国家相类似，坦桑尼亚统治精英渴望充分发挥前殖民语言作为阶层分化标志的作用，以确保本阶层独享特权地位。教育的精英特质突出体现在斯瓦希里语教学和英语教学的极度分化，学校因此成为一个生产文化区隔的场所。精英阶层之所以致力于开展前殖民语言教学，目的在于实现精英圈（Elite Closure）的再生产。几乎在所有后殖民非洲国家都可以寻到精英圈的踪迹。教育沦为维护特权的工具，高等教育更是成为生产精英的机器。有数据显示，一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及总人口的1%。^③ 教育精英化直接导致辍学率和降级率居高不下，教育事业发展迟缓，国民识字能力低下。教育危机反冲到社会层面，致使国家民主进程停滞不前；国民无法充分为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出谋献策；少数人长期垄断政治权力，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本土语言严重消亡，极大影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① Hennie Kotze and Carly Steyn, *African Elite Perspectives: AU and NEPAD*, Johannesburg: Konrad - Adenauer - Stiftung, 2003, p. 12.

^② Sarah Karinge, “The Elite Factor in Sub - Saharan Africa’s Development: The Urgency in Bridging Disparity”,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Vol. 29, No. 4, 2013, p. 442.

^③ “Facts and Stats on Education in Africa” (Part 2), <http://www.achieveinafrica.org/facts-and-stats-on-education-in-africa-part-2>, 2014 - 12 - 04.

几乎所有后殖民非洲国家都保留了前殖民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延续了殖民母国的价值体系。这一导向在赋予精英家庭巨大优势的同时，强化了非精英家庭和民众的不利地位，进一步加强和机构化了文化资本的不均衡分配。

结论与思考

近现代以来，坦桑尼亚历经了殖民统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3个发展阶段，与此相伴的是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语言地位在国家发展历程中的起伏涨落。斯瓦希里语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坦桑尼亚正在逐步远离建国初期的“斯瓦希里化”梦想，教育本土化大业不断受到侵蚀。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置于同一国际视野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坦桑尼亚青年一代的信仰。在语言政治化、精神殖民化、教育精英化等多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斯瓦希里语的发展渐趋迟缓。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独立半个世纪后，坦桑尼亚仍未在发展上取得长足进步。顺鲍（Beban Sammy Chumbow）将这一状况描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①，即尽管出现了可喜的经济增长迹象，但仍普遍存在城乡发展严重不均，阶层间贫富、权力分化极其显著，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等现象，市中心的摩天大厦与周边乡镇的低矮民居形成强烈反差。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发展”这一话题从未将语言因素纳入全面考量之中。斯瓦希里语有助于促进知识和信息传播、加快民主建设进程、消除社会分化、推动国家发展，但当学校教育一味忽视学生所了解、所感知的，同时在西方国家和统治精英的支持下，英语被扶持为斯瓦希里语的强劲对手，由此隐含的信息便是本土的语言、文化和体验没有任何价值。学生在认知和心理层面上的双重创伤，以及对本土语言、文化价值和自身存在价值的质疑均将最终危及社会的整体发展。

语言议题最终是一道政治议题，社会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反映并作用于语言层面。语言关系不平等源于人为建造的语言等级结构，西方国家炮制出

^① Beban Sammy Chumbow, "Linguistic Diversity, Plur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Vol. XXXIV, No. 2, 2009, p. 23.

的国际语言等级制是世界范围内语言不平等的症结所在。^① 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在坦桑尼亚的角逐既是国际语言格局中力量抗衡的一个缩影，又是后殖民非洲国家中本土语言与前殖民语言间存在地位等级势差的一个有力证明。

A Study of the Issue of Medium – of – Instruction in Tanzan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ization

Li Dan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Tanzania has neither gone through any violent social or political disturbance, nor existed any intense ethnic or racial contradictions. Swahili, the interethnic language,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Tanzania is progressively drifting away from the cause of *Swahilization*, which was the main target at the earlier period of its foundation. The language game between English and Swahili in the educational arena has stirred up the crisis of medium – of – in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Swahili has slowed down, and the cause of indigenization of educ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eroded. After some comprehensive analyses, a conclusion has been drawn that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languages, colonization of mindset and elite – model education, have severely disrupted several attempts to broaden the functions of medium – of – instruction for Swahil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rivalry between English and Swahili in Tanzania is fundamental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language status differentials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countries.

Key Words: Swahili; Indigenization of Education; Medium – of – instruction Crisis; Language Status Differentials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冯基华)

^① Jan Blommaert, “Situating Language Rights: English and Swahili in Tanzania Revisited”,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Vol. 9, No. 3, 2005, p. 390.